

二十世紀工業化、資本主義 對人類文化深層影響

辛 旗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二十世紀工業化、資本主義 對人類文化深層影響

辛旗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1999

作者簡介

辛旗爲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臺灣研究會理事兼特約研究員、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理事和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二十世紀工業化、資本主義對人類文化 深層影響

作 者：辛旗

出 版：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84-86 號
崇正大廈 9 字樓

◆電話：(852) 25749882

◆傳真：(852) 28347749

版 次：一九九九年三月第一版

印 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國際書號：962-8479-06-7

定 價：港幣 20 元 ◆ 臺幣 8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二十世紀工業化、資本主義對人類文化深層影響

辛旗

引言

二十世紀人類進步在量變和質變的程度上是以往所有世紀無法比擬的，其中尤以物質文明的躍進最為突出，工業化程度又被當成是物質文明的重要指標。隨著對自然界的征服和人類探索周圍環境的能力增強，尺度加大，範圍拓展，人類在工業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有異於以往世紀形成的價值觀念，涉及到人類的精神生活、對自然界的看法、對生命意識的重新思考。無可否認，在二十世紀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制度是商品經濟至上的資本主義，其根基是十六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經濟力在資本的引導下的全面擴張，出現了殖民地、市場、新的商路、金融體系，直至國際關係中的勢力範圍和複雜的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互動模式。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對人類命運的最大影響莫過於文化在新的物質手段介入下發生的裂變。本論文嘗試從工業化社會的文化特徵、「社會病理學家」對本世紀資本主義的文化剖析、世紀末人類社會形態的「大震盪」等幾個方面，揭示工業化、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勢和未來發展趨向。

工業化社會的文化特徵

物質進步：二十世紀工業化的時代標誌

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物質進步成為二十世紀的標誌。儘管天災、人禍、政治動盪、經濟蕭條，以及其他各種暫時的倒退現象是歷史的常態，在本世紀即使是相對落後的國家，每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還是能夠超過他們的前輩。現在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的糧食、工業產品和主要生活用品大多生產過剩。超級市場中，每天供應各式各樣的食物比我們前幾代人一生享用的還要多。先進的醫療條件和保健制度已經使得發達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由一九一零年的四十五歲增加到今天的七十三歲。在鐵路興建前，很少有人長距離遷徙，離開自己居住的地方，現在每天有成千上萬列火車穿越各大陸和江河。在世紀初，高中生只佔受教育者的十分之一，今天，大學文憑成為就業的基本條件。電訊傳播在十九世紀末仍是最昂貴的商品，現在通過電訊取得信息和知識的費用十分便宜。本世紀九十年代，各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比二十年代美國最為富有的資本家還奢侈。在完全工業化了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人們通過從事各種職業勞動和商務活動，可以輕易獲得更多的收入、更大的住房、更多的社會交往機會。

本世紀工業文明顯示出四種趨勢：

一是知識的積累、增長變成了物質力量。科技成為了工業化的推動力量，當燃煤為動力的大型熔礦爐問世，鐵取代了木材成為機械、建築與運輸工程中的主要材料。德國、美國繼英國之後，首先發明了氮化肥、內燃機、汽車、飛機、電力系統、電報、電話、自動生產線、合成物質與藥物抗生

素。改良後的傳播與交通運輸系統促進了這些先進發明的傳播與普及。衛星和光纖通訊以光速用各種方式在全世界傳遞信息，達到了物理學的極致。能源可以很容易地用石化、氫電離子、核能取得。疫苗接種和抗生素的使用，使得發達國家幾乎完全免於傳染性疾病的威脅，多數人可以盡享天年。工業的發展，減少了農民的數量。製造業的生產力在本世紀的增加高達十倍以上，產業工人的數量在七十年代後也開始大幅縮減。

二是自由商業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商業體系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誘因和進步的結構，二十世紀初，人們開始把旅遊、商業交易、自由就業看成是個人擁有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某一社會階層應有的特權。英國十六世紀光榮革命形成的對私有財產保障的傳統，到了二十世紀已風靡全球，成為各種政治制度的憲法制訂。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我們描述的商業自由化趨勢已經徹底實現，自由市場已經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三是市場的擴展。交通運輸網絡化和傳播技術的改進，形成了強烈的市場擴張效應。以前市場的範圍不會超過運輸貨物的範圍，就業也在這一範圍之內。本世紀，運河鑿通、鐵路建成、飛機發明、輪船的超大型化突破了數千年人類之間的地理距離，迅速地將工業化進程推展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已經整合成為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通過關稅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組織，形成了一體化的世界市場。

四是資本積累。金融機構與聯合股份公司為達到商業目的而集中資本的過程開始於十八世紀晚期的英國。在這之前，只有國家才能通過稅收募集到足以支持大規模建設計劃

的資金。國家在這一資金募集過程中，產生了軍事武力和其他令人嘆為觀止的公共建築和社會過程（如長城、城堡等防禦工事，以及運河、水利設施等大型建設項目）。私人商業資本一般投注到貿易活動中，而非製造業上。因此，大部分的私人企業都是勞力密集型的，而非資本密集型的。但是，勞力如果不與資本充分地融合，將無法產生剩餘價值和利潤，導致資本不足，勞力處於簡單生產維持溫飽水平。私人資本的投入與節省人力的科技結合，突破了惡性循環。二十世紀，投資淨值在前二十五年平均增長了近兩倍。資本先是流向紡織業、道路、運河，逐漸擴展到所有的生產領域，資本的擴張增加了私人的儲蓄，產生了積累性、自發性的資產剩餘，西方的經濟開始在三十年代蓬勃發展。這個良性的循環模式幾乎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帶動了全世界各個地區工業、交通運輸、醫療、保險、金融、股票市場、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傳播通訊網絡在人類居住的所有地區逐漸地蔓延開來。

在二十世紀裏，物質的進步大體上塑造了工業時代的基本特徵。在許許多多的領域，人類既有成果幾乎達到了極限，再次突破現狀，從物質的進步角度難上加難，人類內在的限制（智能的有限和生存價值的迷惘）和外在的制約（比如能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生物鏈的斷裂）已經使得人類物質進步的速率減緩下來，九十年代末經濟的衰退是具體表現之一。人類的生活水準也已經達到了一個無限持續的高原期，未來的進步將在物質與精神的中介領域中展開，比如，信息產業、生物工程、智能技術以及與流通相配合的所有社會的服務領域。

非人道的「技術至上社會」

二十世紀人類物質力量的巨大進步是，將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發展為強大的科技系統。用本世紀德裔美籍著名思想家佛洛姆（Erich Fromm）的話說：「一個致力於最大規模的物質生產和消費的，為整個機器的由計算機所控制的完全機械化的新社會。」¹人本身被「異化」了，人們正失去對自己體制的控制，我們開始執行著計算機和網絡給我們的指令，除了更多的生產、追求經濟增長的指標和刺激消費之外，人類似乎已經無其他的理想。事實上，人類不僅在自己製造的武器毀滅的危險陰影之下，而且在哲學的意義上受到了被動性所導致的內在死亡的威脅。二十世紀人類已經成為自己巨大創造力的囚徒。由於人類片面強調科學技術至上、征服自然、物質消費，人類喪失了與自身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廣泛接觸，喪失了宗教信仰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人道主義的價值，倚重物質和技術的價值，喪失了深層的情感體驗能力。社會體制同樣受其影響，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擴大消費、攫取自然資源的基礎上，政治體制也在呼應著產生能夠領導人類提高征服自然能力的政治家，人類生產導致自己毀滅的商品（當然包括特殊商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工業化的確強大有力，以致於反過來支配了人類。對二十世紀科技工業化帶給人類生活的革命性變化的正面意義不容否定，我們按此模式生活實際上就是在讚揚它，所以此處對正面功績不再贅述。問題是，多數人仍然認為，工業化、科技化、電腦化是人類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沒有看到這樣一種危險：如果允許科學技術、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它們就會像癌細胞一樣蔓延開來，最終威脅到人類的個體和社會生活的整個系統和全部過程。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色是，人用機械能（蒸汽、煤炭、石油、電和原子能）替代生命能（動物和人類的體力能源）。這些新的能源是工業生產急劇變化的基礎。與這種新的工業潛力相聯繫的是特定的工業組織（各類企業）和將產品變為商品流通消費的機構（各類商業公司）。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人類思想被機器思維和邏輯所替代。控制論和自動化使得製造一種新的功能遠比人腦更為精確的電腦成為可能。控制論還創造了新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通過網絡和全球一體化，跨國公司成為了經濟機器和金融體系的中心，企業甚至政府都由清一色的技術專才所把持，私人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變為組織生產和執行生產和銷售的技術與商品因素的互換關係。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發展起來的現存技術系統，對於多數人來說，是人類進步的標誌，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增，政治自由化程度提高，二十一世紀，人類似乎可以在各個領域都坐享其成。有誰料到「公元二千年可能並不是一個人類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時代的完成與終結，相反卻是一個人類不再作為人類，而轉變為沒有思想的和沒有感覺的機器時代的開始。」²事實上，這種預言在十九世紀就有天才的哲學家提出過，馬克思就看到了龐大工業的機器生產給人類帶來的危險，相信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必然要轉變為一個人道化的社會。美國當代哲學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技術與文明》一書中深入揭示了工業社會的文化意義。他提出了「巨機器」的概念——人類早期社會由絕對統治者支配的、在宗教和武裝貴族支撐下的人類集體機器。它是以後人類製造機械的原型。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借助簡單工具，在「巨機器」的操作下的產物。巨機器的權力與威嚴來源於宇宙規律、精確的數學計算、絕對的機械秩

序和物理學定律的強迫性，始見於天文曆法，以後轉移到人類的社會管理和軍事征服。「巨機器」的缺陷在於人類在治水、種養殖農業和城市建設的同時，對自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從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馬雅文明的消失可以理解這一點。二十世紀工業化的發展，也是一個重建「巨機器」的過程，通過科技手段形成人類的整體組織和同質化程度極高的社會系統，人類只作為「巨機器」的零部件發揮作用。

二十世紀的「技術至上」的工業化遵循著兩大原則：一是「凡是科技證明能做到的都要讓它成為現實」。依此原則，原子彈出來了，化學武器出來了，人造病菌出來了，克隆動物出來了。傳統人文主義的價值（符合真、善、美，理性與情感合一原則的事才能做）被徹底否定，科技發展成為了倫理學唯一的基礎。二是「追求效率與產出原則」。最大效率的需求導致對最小個體性的需求，社會機器越有效，個人就越被削減為一個純粹的量的計算單位，也就越是排斥人的個性。最大產出要求的是，生產總量的提高是衡量經濟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工業依賴於消費者的需求，需求要用商業的廣告來引導，生產—消費的模式導致社會的不平衡發展，生活的「質」喪失了重要性，人類改善社會條件的手段變為了目的。人成了機器的附屬品和純粹的消費者，生活的目的是擁有更多的消費品，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從事自己不感興趣的生產，生產不感興趣的商品，而不生產時，他們被廣告和大眾文化牽著鼻子盲目地去消費。人的被動性成了二十世紀工業社會中人的重要心理特徵之一。它是「異化綜合症」的一個癥狀，他不能支配自己的時間、空間、興趣、愛好和理想，甚至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

根本就不知道主動的人性化理性和理想。他不再與自然界發生積極的聯繫，屈從於他的偶像和社會文化引導的需求，他總是有無力感、緊迫感，孤單無助而且憂慮地惶惶不可終日。

工業社會中的文化慘境

工業化和隨之而起的社會現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二十世紀整個人類命運中的全球性問題。工業化社會的現代化就是經濟的飛速增長帶來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帶來了代議制政治民主，帶來了社會生活全面脫離宗教和神話，走向世俗化。現代化的基本特徵是高度的工業化、商業化、現代技術的全面運用、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姑且稱之為「進步」），以及由於現代技術擴展帶來的一切後果——給予人類精神、價值和社會處境的後果。人類在二十世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技術困境和價值虛無。所有的社會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地觸及到這兩大問題。這也是工業化、現代化中的文化觀念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時代從文化學的意義上命名可以稱之為「科技—工商時代」。這個時代的本質用本世紀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技術理性」。由於技術理性的單一霸權，任何其他精神上的信仰都在物質創造和商品消費的浪潮下，消逝遁形。技術理性也成為了技術困境，因為「價值虛無」應運而生，「科技—工商時代」的倫理道德和哲學思考方面出了問題，信仰危機隨處可見，兩大問題是互為表裏，相輔相成的。本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從工業社會中科技發展中引出的「技術」問題剖析了問題的實質，令人豁然開朗。海德格爾

使用了自造的哲學概念「入型」，³藉以說明：作為整體的工業化、現代化中的科技，其基本的特徵就是對世界中的現實的總體客觀化。一切都可以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電磁學、天文學、醫學的原理的指導下，通過工業機械原理的作用來製造、製作。社會的一切都可以通過理論的剖析，人為地操作，人類面對的所有一切都可以通過技術來控制和改造。人類技術的擴展和蔓延沒有任何的界限和道德限制，人類可以說已經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技術精神——「入型」精神——所專斷、操控了。

「入型」技術所規定的二十世紀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無外乎先對任何的現存事物「歸類入型」，然後按照它們的物理學屬性「入型」到對人類發展有用的領域，如煤炭、石油作為燃料，鐵礦石作為工業原料，人作為勞動力，土地作為商業炒作的商品，再「訂造」、「製造」成新的適應人類工業化、現代化需要的客觀物質。依照海德格爾的觀點，這種「入型」和「客觀化」的處事態度根植於西方的形而上學之中，屬於「存在歷史」的命運，可以說是命定的，由於西方工業化現代化模式風靡世界，這種「入型」的方式必然成為世界性的。在二十世紀，一切都被數量化了，一切變得可測度、可計算、可交換、可創造、可複製了。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期曾經指出，在資本橫行的社會裏，一切都可以用金錢價值尺度來度量，就可交換、可買賣。這裏所說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人類精神價值領域、道德領域，也必然包括人類生活最為生物化的領域——性。如今不論在西方、東方、中東、非洲、拉美、全世界各地區，不論社會制度如何，只要黏上工業化、現代化和科技化，一切都已經納入了量化和計算之列。生命行為的質量已經被數量所取代，甚至

生命形式本身都列入了「入型」的範疇，克隆人類的技術近在咫尺，人類的社會生活也變爲了「入型」之後的各種數量關係了。

與工業化、現代化通過科技數量化客觀存在的後果幾乎一致，現代「科技—工商時代」通過技術對人類生活進行簡單化處理，特別是通過現代通訊和影視技術，把人類生活變成了可以複製、可以演示、可以逆轉、可以組合的機械事件。人類社會發展和生活的神秘性消失了，生命存在形式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消失了，一切都納入了千篇一律的統一形式當中（即「入型」）。當代著名作家、哲學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的藝術》中引用了海德格爾的一段話，「由於現實就在於可計劃的計算的千篇一律狀態中，所以，就連人也必須進入單調一式的狀態之中，才能應付現實事物。在今天，一個沒有制服的人已經給人一種不再歸屬於此世的不現實的印象。」⁴ 昆德拉從海德格爾對技術本質的論述中提煉出一個關鍵詞——「同制式」（uniform），說明現代人在工業化、現代化技術的「定置」之下，不得不「入型」，就像穿上了各式各樣的統一的制服，成了「同制式」的人。而本世紀著名的存在主義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在小說《套中人》裏，形象化地描述了這種「同制式」人的感受。在卡夫卡之後，當今的世界在「同制式」方面，借助對於生命進行的計算、計劃和社會化管理的龐大的科技機器，人類「入型」的程度又進一步的提高。

尤其在世界範圍內商業和金融一體化的九十年代，現代技術通過電腦網絡和衛星通訊傳輸，使得數量化的商業市場的一切都在「拉平」，出現了不同落差發展程度社會的「逐漸水平狀態」。信息工具和現代傳媒手段把人類社會生活置

於一種匱乏特殊性的均勻狀態中。一切精神價值等級體系和宗教式的純粹理想，都難以確立和維持，終極的、絕對的道德和信仰修養變成了不值人們一顧的空泛理論。遍及二十世紀所有時段、所有地域、所有種族、所有文化、所有年齡層次、不同職業的人們之中的道德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泛濫流行，難以遏止，這不是偶然發生的，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科技—工商時代」單純科技的物質力量具有對人類精神價值普遍的銷蝕和摧毀作用。使人類「入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科技價值，最大的傷害不僅在精神方面，還在於割斷了人類與自然界的直接關係，我們生活在鋼筋水泥中，坐在或騎在車上，行在柏油路上，我們生活的場景已經遠離了自然大地，自然的一切特性已經無法直接與我們的心靈貫通，我們與自然山水、動物花草之間的關係，成為了主客體和對象性的利用關係，我們在工業化、現代化的「科技—工商時代」裏幾乎出現全面的「人性異化」。

社會病理學家的敏銳洞察力

二十世紀與「單向度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有了飛速的發展，特別是六十年代以來，經歷了以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科技革命，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變化。在所有制方面，科技革命使勞動工具成為極為複雜的自動化系統，大大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這就需要集中大量的資金，於是股份公司形式的資本合作所有制，成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同時，發達國家國有化企業比例增大，國家和國際組織在經濟中的調節和控制作用也增強。科技革命

形成了專業的經理階層，白領工人的比例也超過了藍領工人，體力勞動者加速了知識化的進程。資本主義國家廣泛採取了高生產、高工資、高消費的政策和社會福利保障措施，中產階級擴大，勞資關係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美籍德國哲學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稱之為「富裕社會」，並認為是「病態社會」。他在《當代工業社會的攻擊性》一文中概括了富裕社會的特徵：工業技術力量的高度發達，並用於生產和分配奢侈品；生活水平提高，階級差別縮小；經濟和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和壟斷；帶有政治和商業目的的科學研究高度發展、資本集團對勞動者工作和業餘生活時間的控制，促使了人類生活全面地商業化。這個「病態社會」的特徵有兩個方面。

第一，當代社會使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手段已經控制社會物質生產的全過程，加強了對人類的心理、意識的操縱和控制，使人們徹底屈從於社會總體的需求，使人在經濟、政治、科學、藝術、哲學以及日常思維中，只有與現存制度一體化的一個方面，一個向度，而喪失了第二個方面，第二個向度，也就是喪失了對現存社會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喪失了理性、自由等價值，人性遭到摧殘。現代社會走向了變相的極權主義，人成了被控制的工具，自動化更將人類變成機器，人和物都成了管理的對象。「抑制性的社會管理越是合理，越是有成效和技術性強，受管理的人越是難以打破這種受奴役狀態。」⁵現代社會還創造了一種生活方式，促使人變成只追求物質的人，喪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維能力。先進的工業文明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產率、增長和擴大舒適生活品質的能力，使得「人們似乎是為商品而生活，他們把小汽

車、高傳真裝置、複式家庭住宅、廚房設備當成了生活的靈魂。」⁶ 現代社會大量運輸與通訊工具，衣食住行各種商品，娛樂和媒體產品，都帶有固定的態度和習慣。人們在接受商品的同時，也被灌輸了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單向度的生活方式。科學技術雖然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仿效意識形態，對現存制度辯解，起著使人服從社會、穩定統治制度的職能。科學技術越發展，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就越有控制性。電影、電視、廣告對人類的壓制作用顯而易見，個人的意識空間幾乎全被技術現實所侵佔和侵蝕。人們普遍有一種跟著感覺走的傾向。

第二，當代社會具有極大的攻擊性。社會增強了人的破壞本能表現在：當代社會的軍事化。「我們把富裕社會的軍事化看作為攻擊傾向的最突出的社會動員。這一動員遠不只局限於徵集義務兵役和建設軍火工業，它的真正全貌在向『公眾提供精神食糧』的宣傳中暴露無遺。」⁷ 現代社會的攻擊性也是「工藝攻擊」。攻擊工具是十分自動化的機器，「攻擊的新形式進行毀滅，而人不必弄髒雙手，不必玷污肉體，不必加重精神負擔，殺人犯還是乾乾淨淨的——從生理上和精神上來說都是如此」，個別的人的負罪感和責任心被技術機器和政治機器所淹沒。此外，現代社會的攻擊性也表現於對生態環境的攻擊。商業擴張的結果是摧毀了大自然，壓抑了富有生命力的性本能的浪漫幻想。當社會具有了全面的攻擊性，表明「這個社會只有了一種自殺的傾向，而且我們可以在個人的本能結構裏找到徹底毀滅全球這場遊戲的根子。」⁸ 馬爾庫塞把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描述為這樣一個公式：「技術進步 = 增長的社會財富（不斷上升的國民生產總值）= 擴大的奴役」。⁹

奴役的直接結果是人格的扭曲，資本主義文化中人格的中心問題是「疏離現象」。佛洛姆認為，十九世紀西方社會特徵在本質上是競爭的、囤積的、權威的、侵略的和個人的。剝削和囤積造成人的苦難，工人階級成為受害者，亞非拉各洲成為歐美帝國主義任意宰割的對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改革運動希望治療這些社會病態，從無政府主義到馬克思主義，都強調廢除剝削，解放人類。經過五十年各種類型的社會革命，資本主義似乎變得健康起來。「實際上，二十世紀儘管擁有物質繁榮，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紀似乎比十九世紀病得更嚴重，史蒂文森曾經簡明地說，的確『我們不再有成為奴隸的危險，可是，我們卻有變成機器人的隱憂』」¹⁰他認為，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人格影響的中心問題是「疏離現象」。「就是一種經驗方式，在這種方式中，人體驗到自己像是一個異鄉人，甚至對自己都感到陌生。他並不覺得自己是他小天地中的中心、本身行為的創造者。他所體驗的是，他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產生的後果，都成為了他的主人，他服從這些主人。」¹¹這旨在說明，人嚴重的異化，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個貧乏的「東西」，需要本身之外的東西來充實。

何以產生這種疏離現象？現代西方社會的生產過程、消費過程、人際關係已經使人成為了工業和商業金融網絡中的單調的組成部分和機器。在工業社會中，工人成為一個經濟性的原子，按照安排好的步驟來運轉，經理階層也是如此。在消費過程中，消費成了本身的目的，並被社會輿論和商業廣告所控制。人與人的關係是兩個抽象的生產機器、商業體或經濟體之間的相互利用和利益交換關係，在人性表層之下是赤裸裸的疏離和冷漠。現代人所體驗的自己，就像是一件